

“第四届日本侵华史学术研讨会”纪要

陈 丹

2003年9月13日至14日,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美国的日本侵华研究学会联合主办的“第四届日本侵华史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会议室召开。来自中国、美国的专家学者共50余人与会,就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暴行、战争遗留问题、对日外交“新思维”等有关历史及现实的学术热点问题进行了交流与讨论。中国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的记者和人民网及918网的代表采访了会议。

一 关于九一八事变及日本侵华暴行问题

九一八事变已经72周年,对其原因、过程及影响仍是这次会议研讨的重点。北京大学历史系荣天琳通过回忆自己亲身经历的“九一八”和日本的侵略暴行,指出:“九一八”以后日本对华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日本占领了东北后在东北实行殖民统治、进行奴化教育;而且现在日本仍有一大批右翼分子对中国怀有野心,国人需提高警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居之芬利用残存的历史档案,研究了劳工问题。她指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实行全面的强制劳工劳动;日本征用劳工的体制有三个:治安较好的从周围村子强征劳工服役,治安不好的一半是从周围征用、三分之一是从别

处征来不给回家的时间,还有一种战俘劳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林晓光认为,抗战时期,在军事战场上国共都进行了艰苦斗争。他认为影响蒋介石做决策的因素很多,应利用中、美、俄、日等各国的资料进行研究。他说:日本政府内部对与蒋交涉有争议,但只是对方式有争议,其根本目的是一致的。

北京大学历史系刘一皋指出,战前中国政治是多元的,抗战开始后,中国政治走向二元化:一方面政治趋于集中,另一方面因为要动员全民抗战因而势必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这种二元特征对战后中国政治的影响很大;中国国内现在基本没有纪念性的活动,他呼吁政府指导全民养成一种稳定的历史观念。

日本侵华研究学会会长熊玮报告了美国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建立以来的活动情况:2003 年 1 月 18 日浩劫纪念馆临时馆成立并展示了大量南京大屠杀、九一八事变照片和其他资料;2003 年 7 月 17 日针对日本国会议员“南京大屠杀是谎言”的言论,在美侨胞到日本使馆前抗议,并且发表至日本首相公开信和对日使馆提出抗议书;2003 年 8 月 29 日针对齐齐哈尔毒弹事件,举行了大量活动,并通过搜集资料与媒体合作等方式在民众中进行宣传。她指出:海外华人的一个重要的任务是通过各种渠道使全世界知道中国在二战中的伤亡比犹太人更惨重;虽然日本在华进行过毒气战,但他们始终不承认,对此,我们应该讨论并要求解决,而所有这些也有赖于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

二 关于战争遗留问题

抗日战争结束后,战争遗留问题并未最后解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曾景忠认为,日本政府对解决侵华战争遗留问题负有责任。战争遗留问题主要有武器遗留问题、领土问题(钓鱼

岛)、战争赔偿问题及对战争认识问题。他认为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日本政府、取决于日本政府之政策及态度。

军事医学科学院郭成周介绍了炭疽的特点及危害性,介绍了浙江、江西等地的烂脚病情况,并展示拍摄的受害人现状的图片及受害人的控诉,用以说明日军对中国民众的残害。日本战犯供认1942年日军曾使用炭疽菌,这与在中国发现的病例的时间吻合。细菌战受害对日诉讼代表团团长王选利用医院调查及数据说明日本在中国使用了炭疽,中国有大量人群在同一时间、地点发病。记者李晓方也向大家报告了两年多时间调查炭疽菌情况。其调查结论是:时间都集中于1942年7月至9月、发病区域广泛、发病密集、病状与炭疽病菌症状一样、人畜共患。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抗日战争暨遗留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何天义认为:关于毒气战遗留问题,日本当局采取了拖延的态度。中国劳工对日民间索赔进行得也并不顺利,需要建立有代表性的有权威的劳工组织,抓紧时间抢救受害者证言等资料,互相支持、以整体名义给日本以压力。

康健律师介绍了细菌战、慰安妇受害索赔情况,建议学者多多加强史料的运用。

日本侵华研究学会会长吴天威指出日本掠夺了东北粮食的45%以上,掠夺了大量东北的劳工而且掠夺了中国大量的金银财宝。日本在二战中虽然战败,但其损失很小,还有很大的实力,工业生产力量仍然强大。日本应向德国人学习,拿出大丈夫的勇气,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个不是钱的问题;他还认为,对于美国的政策,中国不能以中国传统的礼仪等来分析;美国的政治是受日本的影响的。

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罗焕章采用个案分析法,分析了麻生太郎的历史情结,指出:从19世纪后期至1945年的历史

来看,日本是最富侵略性的国家,且其侵略思想根深蒂固。要以科学的历史观正视历史,如何对待日本侵华史,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麻生太郎认为日本的侵略史观是正确的,这一言论是对历史的歪曲,这是一种军国主义史观;麻生太郎要为其祖父吉田茂正名,这实际上是颠倒历史、歪曲历史,而且使日本的国格、诚信荡然无存。

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贺新诚认为,日本右翼翻案风的基本论点有三个:正当权益论、道义战争论、战争责任在中国论。日本右翼的所有的观点都从这三个观点出发。日本推卸战争责任的借口有:以中国赤化为借口、以中国抗日排日为借口、以南京政府革命外交为借口、以第一枪为借口、以汉奸自愿为借口。他对这些论点和借口一一进行了批驳:在日本最初开始侵略时并没有共产党的存在,而且中共在成立初期力量很小,但是这没有影响日本的侵略步伐,因而赤化借口是不成立的;中国的抗日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源于日本侵华;日本侵华的步步扩张促使中国抗日的高涨;革命外交是缘于中国在外交中处于被动地位;日本以学术的第一枪问题来推卸责任,实际上是为了转移视线,来掩盖其侵略的实质;所谓汉奸自愿也是颠倒因果的一种借口。

三 关于对日外交“新思维”的问题

去年年底以来,有的学者提出:为了打破中日关系的现状,应从国家战略上进行对日“外交革命”,推行对日外交的“新思维”,为此要“超越”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这种主张,同样引起了与会代表的重视和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首先提请史学界关注对日外交“新思维”的问题。他指出: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十

分复杂,有些历史过去了对现实不会产生影响,有些则会;中日关系的历史对现实就会产生重大影响。日本政要参观靖国神社,齐齐哈尔事件等都证明了历史与现实不可分割。日本侵华的现实对现今处理中日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研究日本侵华史就是为了更好地处理现实中的中日关系问题。

香港纪念抗日受难同胞联合会主席简兆平回顾了近年来中美三国关系的进展,认为在强调与日本和美国友好的同时,不能不看清其真面目,要谨记历史,以史为鉴。

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牛大勇指出必须正视历史,才能处理好现在及将来国家之间的关系,创造中日关系的新的未来。他说:如果两国或多国对以前的历史及对什么是侵略什么是反侵略不能达成共识,怎么能有互亲互谅的基础?如果否认历史,怎么可以说这类事情在未来不会重演?如果两国的下一代对这些历史认识的认知差距太大,两国的关系是不稳固的;历史学家研究的目的是弄清历史的真相,同时对其加以解释。

北京大学历史系臧运祜根据中日两国近年对于青年进行的调查情况,认为当前有人提出“新思维”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处理历史问题对现实有着重大影响。必须审慎地处理历史问题。

吴天威认为处理中日关系很简单,只要日本能承认战争罪责、承认对中国的侵略、对中国民众进行赔偿,并且不支持台独。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陈铁键指出:近年来中国对日本人不信任及日本对中国人不信任的百分比都在上升。中国百分比上升是日本造成的,日本年年参拜靖国神社、年年否认南京大屠杀、年年否定侵略等活动反而教育了中国人,这一点中国人要感谢日本人。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反感的加深是由日本政府造成的。靖国神社大部分供奉的都是战犯。靖国神社的存在及日本政府的的活动是对历史的背叛。

北京大学历史系王立新指出:有的学者针对中日之间互不信任的程度的加深以及从中日美三国战略关系来考虑,提出了对日外交“新思维”。从纯学术的观点来看,这种观点有很多令人启发的地方,而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以纯学术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又是一种失误;从当前中日关系的背景来看,这种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日本右翼势力对于“新思维”的出现感到十分高兴。追求国家利益不能不顾及民族情感,也不可能实现联日制美的策略。这种“新思维”无助于日本的反省;“制美”的观点也是值得讨论的。不是中国需要新思维,而是日本需要新思维。

(作者陈丹,1980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2002届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兵)